

「反右」五十周年專輯引起了關注。2008年將是中共發動大躍進五十周年。懇盼海內外學者同仁賜稿，各闢蹊徑，深入剖析人類歷史這一宏大但卻悲慘的烏托邦主義實踐。

——編者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 中國知識份子的蛻化

裴毅然的文章〈自解佩劍：反右前知識份子的陷落〉（《二十一世紀》2007年8月號），讀後令人扼腕長嘆。八年前，我採訪過當年清華「欽定」「右派」黃萬里教授，得悉其父黃炎培1945年在延安同毛澤東的談話有一段未公布的內容，大意是：黃問毛，中共建國後如何對待自己的元勳功臣？毛答會善待他們的。而後來的歷史事實是昭然若揭。讀了裴文，我由此發想，當年黃炎培等人是否會向毛問起，中共建國後如何對待知識份子之類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知識份子的危難和悲劇、知識份子問題的離散和多重，成為中國現代史的「底色」或「棱鏡」。通過裴先生細緻的梳理和深切的分析，不難發現，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命運異化和心靈自我異化的歷史。這種種異化和自我異化的廣泛和深重超過了中國其他任何一個階層或人士。

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並不具備知識份子所擁有的獨立社會地位和人格精神，所以也就不可能從事獨立

的社會生活批判和思想文化創造。正是因為沒有這幾種「獨立」，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歷史的苦難和危機一次次地再現，中國知識份子的反思卻一次次地驚人地相似、重複甚至蛻化，因而中國知識份子至今都無法展現出與其悲哀遭遇和歷史劫難相匹配的精神昇華及其重大成果！

唐少傑 北京

2007.9.8

## 關於「群體性事件」的兩個看法

徐賁的〈「群體性事件」和暴力問題〉一文（《二十一世紀》2007年8月號）最重要的思想，是指出了「群體性事件」暴力發生的啟動因素在於「有權者自己的暴力行為」。就「群體性事件」這個概念本身，我提供兩個看法供徐賁和關心這一問題的人參考：

一，「群體性事件」是當政集團利益一致的產物。雖然今天中國當政集團內部存在着衝突，但這種衝突的主要傾向只是基本利益一致、具體既得利益多少的衝突。在內在的質地上，目前的中共進入到從未有

過的團結時期。由此，當政集團與民眾的矛盾也就愈來愈凸顯了出來，也就有了「群體性事件」這一產物。

二，「群體性事件」是當政集團維持生命力的必要。雖然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但大陸高度集權的基本政治體制並沒有發生變化。任何集權的政治，在其發生和存在的理由上，一定需要宣布存在着某種內在的和外在的威脅。黨內路線鬥爭已經不能作為理由，打擊腐敗問題只能被利用為強化集權機制的有限手段，階級鬥爭理論所導致的副作用具有真正的顛覆性。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尋找新的社會性根據，「群體性事件」無疑是現有歷史階段所可以尋找到的恰當依據。

顧則徐 廣州

2007.9.9

## 民主的才是安全的

林蘊暉在〈高幹右派：反右中的黨內「戰場」〉一文（《二十一世紀》2007年8月號）對反右運動研究領域的拓展和深化有啟發意義，也彌補了這個領域研究之不足。不過，筆者更多思考的是，世界上政黨林

立，黨內的意見分歧、派別鬥爭在世界各國隨處可見，但是，還沒有發生中共高幹在反右和「文革」那樣的悲慘故事。這些可能就是列寧式政黨所特有的。在這樣的政黨內部體制中，每個黨員不是一個獨立的主體，即使是高幹，也不是一個獨立的主體，不能夠擁有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主張。一旦擁有了獨立의思想和政策主張，這個體制隨時就會將他拋棄，甚至出現反右和文革時期高幹們那樣的結局。

在這樣的狀況下，每一個黨員不僅不是獨立的個體，更關鍵的是沒有安全保障。領袖의思想和政策主張是隨時變化的，黨員의思想也處於流動中，而一旦這種流動沒有同步，哪怕是高幹，也就是政治末日甚至生命末日來臨了。從全球的基本經驗與教訓看，惟有在黨內也實行自由民主體制，每一個黨員才是安全的。

丁松泉 杭州

2007.9.9

## 並非只是歷史

上世紀30年代中期的蘇聯與50年代中期的中國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新階級」的出現和「個人崇拜」的盛行便是明證。而這些現象何以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確實能夠引發人們對何謂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入思考。不久前剛剛看了美國「國家地理」攝製的紀錄片《北朝鮮揭密》(North Korea Undercover)，朝鮮這個號稱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也是現在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沒有互聯網和禁止使用移動電話的國

家。對於外國人來講，朝鮮簡直是個完全服從的世界，從那裏我們還能看到當年蘇聯和中國的影子。

其實，對於西方世界而言，在某一特定的時期裏，蘇聯、中國、朝鮮都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而這種所謂的神秘性乃是緣於自我封閉。自我封閉固然有着一定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但是由於執政一方精心隔絕了本國人民同外界的一切聯繫，向人民灌輸一切國家都不如本國的思想，從而構築起一條「人民不宜」的防線，任何企圖或是試圖突破這條防線的人，恐怕都不會得到「好下場」。我想，王思睿〈「主動右派」中的修正主義者〉一文(《二十一世紀》2007年8月號)中的「主動右派」中的修正主義者，正是破圍的先行者和犧牲者。

王昊 天津

2007.9.9

## 對右派的懲罰為何會選擇勞動教養制度？

〈「夾邊溝」右派勞教文學書寫〉(《二十一世紀》2007年8月號)一文主要關注的是夾邊溝的勞動教養制度，以及掌權者對右派的過度懲罰等問題。為甚麼反右派運動會採用勞動教養制度？為何政治運動總是伴隨着對異己份子的勞動懲罰？對人的懲罰首先就是對身體的折磨和摧殘，要麼是嚴刑酷法，要麼是繁重勞動。當前者無法採用的時候，後者自然派上用場。掌權者抱有的一個想法就是，通過這種繁重的勞役，如果你承受不了，你以後的思想總應該更加守法吧？

對於一個以農民為主體而發展壯大的政黨而言，勞動懲罰無疑是一個頻繁使用的懲戒手段。他們自身的經歷已經深深體會到：勞動是怎樣可以將個人的肉體如何慢慢消磨直至耗盡最後一點能量，勞動又是如何將個人的思想和銳氣逐漸消磨殆盡的。那些擅長清談的知識份子尤其需要接受勞動改造，才有可能達到思想改造。

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個非政治文明的國度裏，勞動教養制度的使用是一件多麼自然而然的事，因為它的使用具有諸多的歷史緣由與現實合法性。

阮思余 廣州

2007.9.10

## 更正與致歉

《二十一世紀》編輯部：

拙文〈自解佩劍：反右前知識分子的陷落〉(載貴刊2007年8月號)，存有二錯。一、第34頁「民國26年」應為「民國16年」；二、同頁「錢鍾書……海外投歸」應為「錢鍾書訪學台灣亦北歸」。二誤皆筆者粗疏所致，特向讀者致歉，並向指出後一錯誤的陳福康先生鳴謝。

裴毅然

2007.9.12

8月號劉雅章〈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認識〉一文的譯者「顏少輝」應為「顏兆輝」，特此更正並向顏兆輝先生致歉。

編輯室

2007.9